

25709

洛



第七辑

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洛南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洛 南 文 史

第 七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洛南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封面题字 何伯群

封面篆刻 王延年

编 辑：政协洛南县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 刷：洛南县印刷厂

陕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

陕商出批字第07748号

印数1500册 工本费：2.08元

审 稿: 高天佑

主 编: 时运生

编 辑: 董有贵

洛 南 文 史

第 七 辑

1991·10·1出版

目 录

史料实录

- 商洛“矿乱”考略……………时运生（1）
洛南多经生产史话……………李宗白 王重伦（25）
深山古道忆运猪……………李生智（32）
西峪川大米……………孟广瑜（35）
西安事变时华岳庙的情况……………刘熙杰（36）
当年洛中学生打“上洛三日刊社”真相……………车进行（38）
四麻子戏班……………董生馨（43）
解放初期县干部业余剧团的活动情况……………刘熙杰（47）
张鉴作诗批贪官……………杨希震（50）
石门图书馆……………吕三运（52）
巡检解放前后……………贾耀亭（54）
卢队始末……………宋宪武（64）

社教散记：啊，芬芳的兰草河……………时小卫（68）

人物春秋

- 永怀于右老……………王廷柱（71）
怀念于右任先生……………冯新民（76）
青山绿水昭忠魂……………范石（80）
曹民哉同志传略……………姚景吾（90）
孙通先生传略……………冯新民 姚景吾（93）
张毅生轶事点滴……………杨希震（96）
何秉三先生事略……………吴瑞玲 何新山 庾希斌（98）
上洛人杰薛国用……………蔺艾舍（104）
辛亥人物张进喜的晚况……………张凤仪（107）
民国时期几位热心公益人士……………贾开业（110）
济世活人的名中医—李怀著……………李学靖（114）
奇人奇死李金钟……………乔秀峰（117）
王珍尊师一例……………董有贵（121）

金石录

创立大圣山东峰之上娘娘庙碑序

……………何启明录 时运生改正标点（122）

焦永隆妻张氏碑……………杨建锋抄录点注（124）

文史知识

中国三言历史（续）……………杨运昌（127）

吉光片羽话洛南

洛南明、清、民国时期学人撰述初探（下）……时运生(134)

地名撷英

石鸡的传说……………韩耀华 吕三运(147)

龙潭究竟有多深……………阮马娃口述 崔武整理(148)

文史研究

盛世治史 资政载道

—《洛南文史》价值浅析……………秦海山(150)

文史信息

简讯三则……………董有贵(155)

春天颂歌

诗二首……………何金莲(159)

诗二首……………郝兴超(159)

治理石门西河记事……………张进壁(160)

藏头对联……………柴仲权辑(161)

姬河水库放歌……………王政文(161)

和陆游《咏梅》原韵·····	阮文英(162)
诗词三首·····	刘正虎(163)
词五首·····	时运生(164)

慕生忠与将军楼

赵珍

将军楼位于格尔木市金峰路西端西藏驻格尔木运输总公司的家属院内，座北向南，面阔三间，楼高二层，底楼为拱顶窑洞式结构，二楼为普通砖瓦两出水人字形屋顶结构。这座建筑比起格尔木市林立的楼群略显朴素，然而提起该楼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53年初，西藏军民吃粮告急，中央把运粮任务交给西北局，西北局立即成立运粮总队，调时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慕生忠为运粮总队政治委员。是年10月，慕生忠率领他的筑路铁军，在短短的时间里修复了从香日德至格尔木300公里的公路运输线，1954年12月25日慕生忠的筑路大军经过7个月零4天的战斗，终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圣地拉萨，解除了西藏军民的燃眉之急，康藏、青藏公路于此日同时举行通车典礼。

那个时候的格尔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跟慕生忠将军的同志问“格尔木在哪里？”将军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告诉大家，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那里就是格尔木。

明朝前期，中国农村经过百余年的太平岁月的休养生息，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由于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加之海上贸易繁盛，新城市不断涌现，全国财政税收增收幅度很大，如从永乐二十一年到宣德四年的五年中，没有加税，税收却翻了五倍以上。商品经济象幽灵一样，悄悄游荡于中华大地，当时的西北人民，自己已多不纺织，衣料布匹靠外地输入；南方妇女自己不缝衣，做衣服全靠裁缝。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然而，封建经济发展不平衡。当着富裕的南方已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候，北方还被冰雪覆盖着。商洛山区，地少土薄，交通阻塞，经济停滞，人民贫困，文化落后，智力不开，与全国特别是南方比较，大为落后。但由于明朝初期政治清明，官吏尚能守法，赋税不苛，因而贫穷山区的生产也有了较快发展，农村由复苏渐呈小康景象。《商州志·食货志》记载

说：“商於全盛之时，穷山深谷，皆闻鸡犬；老岩绝壑，亦长麦菽。高高下下，人尽务农。丰不全收，歉不全乏。兼有丝蚕腊虫，椒桃漆药。诸蓄百产，虽多为客商专利，皆足以补衣食之缺，而佐赋税之穷，所以郊野之富，号称近蜀。故其时，在上者度支有余，在下者供应不苦，然且盗宁矿息，民享太平”。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商业手工业发展，水陆交通受到重视。如龙驹寨，是连接湖北、河南和陕西的水旱码头，古称名镇，但因日月潭有大石横阻于丹江中，所以只通小舟，水落时交通被阻滞。嘉靖、隆庆间，除掉大石，路畅商兴，“店廛络绎，康衢数里，千蹄接踵，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商州志·卷二·关市》）。

最能标志当时商洛经济兴旺的是开矿业。商洛多矿产资源，为中国古代“冶矿区”、“铸钱地”。陕州知州、商州正德朝举人任庆云在《坑冶论》中介绍说：古代全国有产金地五处，产水银地四处，产朱砂地三处，其中商洛就各占一处，可见它在全国矿业中的地位重

要。例如镇安县，有金、铜、银、铅、锌、锑、铁诸矿，其中大多数矿点都被古人开采过，仅铜矿就发现古采洞七百多处，如九龙山顶矿有唐贞元年间开的洞；月流台铜矿的古采洞竟深险莫测，使人非常惊奇；而桥梓沟、西光山、二台子等铜矿，也都是明清开采过的。至于铅、锌、银矿，据勘测报告说盛唐时都已采过，其中的石棺铅矿，有一个垂直古采洞，约深数百米，已在明代前基本采枯了。锡铜沟铅、锌矿，发现古采洞达三百三十多处，当时所采矿石，多是就地冶炼，由于建炉很多，这里便叫炉场沟。锑矿的古采洞穴尤多，因古时以锑作银，所以自古以来采掘不衰。有一矿洞上还凿有“唐朝”二字。在古采洞中，每每发现人骨和已朽的桌、凳、铸银币的土模子及炼炉，铸好的银币上刻有“武周”等年号。金矿则自东周以来就不断淘采，夏岭子一带为唐宋时重点淘金处，古采洞星罗密布，蔚为壮观。

镇安的情况能代表整个商洛古代炉冶状况。但应指出的是，古代矿冶是充满血泪和死亡的事业。卞和献玉，被砍去双腿，干将铸剑

搭上了姓名，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历代王朝的利益考虑不同，对矿冶的政策大不相同，使古代矿冶的风险极大，停滞不前。明朝建国后仍禁民间开矿，直到洪武末年，才允许人民自由采矿，于是，私人开矿者愈来愈多，可惜没有私家采矿产量统计，只知全国官冶产量由七百多万斤，增加到千万斤以上，超过了任何时代。故而冶炼技术大大提高，冶铁炉用砖砌筑，高丈余，周围长一丈余，设置两个风箱（古称鞴），燃料用石炭（按：商洛自宋代已开采煤矿，并用它进行冶炼），每日出铁四次，生铁经五、六次能炼成熟铁，经九炼就可成钢。

由于经济比较繁荣，货畅其流，市场上矿产品的需求旺盛，利润极高，农村的剩余劳力又很多，而商洛及其毗邻的卢氏，灵宝等地人民，一般都有开矿传统，因而商洛的矿业便迅猛崛起，大有风靡草偃、星火燎原的势头。如洛南与灵宝县交界的小秦岭金矿硐岔山上有一处石刻，上写：“景泰二年（1451）六月二十二日起，开硐（洞）三百余眼”。《秋浦歌其

十四》形容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⁶

开矿业的兴起，又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一定实惠，既缓解了山区的经济困难，又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但也冲击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一时间，功利主义，趋利挣钱的风气很盛行。虽说，商洛还依旧是小生产者的王国，农业和手工业结合仍很坚固，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生产方式，已在某些局部开始冒头露尖，资本主义萌芽在大规模的矿业生产中已有显现，商洛的经济也和全国一样，出现了一种新发展新趋势，新因素和新契机。假如朱明王朝也能象同时代的英国那样，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开明进步政策，励精图治，奖掖扶植工商业而不摧残它们，帮助资本主义萌芽而不摧折它们的话，我国也可能在近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国富兵强，跻身先进国家之林，至少也会防止这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大动乱，使人民少受水深火热之苦了。

二

不幸的是，中国封建统治已至晚期，它太成熟，太腐朽，也太无能了。面临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不单未能使最高统治者警惕图强，反而倒刺激了他们的“胃口”，使之更加堕落腐化。统观统治阶级的对应之策，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纵情奢侈，任性剥削，血腥镇压。总之是倒行逆施。范廉《云间据日抄》说：“嘉靖、隆庆以来，豪门富贵日益淫奢，士人多缠博带、儒冠、道冠、阳明衣，十八学士衣，竞尚新奇。衣帽用流行品，奴婢俱用细丽器物”。史载明晚期，仅宫女脂粉一项，每年用银即达四十万两。从皇帝到一般地主，追逐货币，满足奢侈生活，所以明代的禁贪法令最酷，而大贪污犯也特别多。他们的剥削首先对准农民。如英宗天顺元年（1457），以“均税”为名，规定“亩科一石”，实际是加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在南方局部加税。由本年起，明朝廷开始出现税收不足支出一半

的窘况，任由户部巧立名目搜刮弥补。三十七年，又追征旧欠，神宗万历四十六（1618）年，全国每亩加征银三厘半，后加至九厘。熹宗天启二年（1622）及思宗崇祯的三、八、十、十二年，都继续加征。

由于农村经济在赋税重压下渐趋破产，而商业资本却在发展，朝廷便又从商、矿税上开刀。全国各州、县、镇、集设立“课税司局”，还设有“抽分局”，到正德七年（1512），商税即增加了四倍。嘉靖时，布匹按尺上税，隆庆时，“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前述龙驹寨镇，“古无商税”，“惟仁民投主”，后设立税司，置税官，定税额，按季收解，经常发生“争利构讼，杀命图赖”的惨事。“绅士豪右皆与牙侩分日权利”后来由于“华商告议”（有背景的大商人告状），陕西巡抚毕源和梁知州两次进行处理，规定“每小舢抽银一钱，头匹三分”，但不能切实实行，后来直闹到“据关市而攫全（收税者想将商品全吞），（商人）望津隘（税司）而胆落”的地步。

万历时，两宫三殿被焚于火，没有钱重修，想出了开矿和加税两条办法。由皇帝亲自派出亲信中官（宦官）到全国各地，“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领税务，或兼领开采……视商贾懦者（势力不大的），肆为抢夺，没其全资，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将货物全收，连行李盘费都没收）（《明史·食货志》），明朝廷成了“榨油机”，全国到处激起暴动，如明正统九年（1444），古宗留发动的福安采矿流民暴动，发展成为浙、闽、赣边区农民大起义；龙溪炉主蒋福成领导福建炉丁起义；嘉靖时王堂组织山东矿工起义；以及广西数万“矿徒”大起义等。

商洛采矿，最初实行“官四民六”分成，矿民有利可图，也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类似承包），但其中就有“赔弊”破产的，明中期以后，地方官鉴于矿税既重而额外摊派又太多，由抚治洛道和州衙，将各种额外负担合并整理成“条编”，但因怕冲撞朝廷，定额本身就定得很高，如一个不足万人的穷县，每年要纳税万两，州上还要再纳一万二千两。何